

## 誰怕眾聲喧嘩？ 兼論訓練無能症

鍾蔚文\*

### 《摘要》

台灣的傳播研究已粗具規模，近年來更是眾聲喧嘩。但在學門形式已備之時，反而可能拘泥於現有知識形式，過度重視學門間之界限，產生訓練無能症，以致扼殺學術的想像。本文主旨有二：一為分析此一症狀之癥候，二為主張可以眾聲喧嘩為處方，發揚社區民主之精神，鼓勵不同理論和方法間之對話。

關鍵詞：眾聲喧嘩、形式主義、本質主義、效度、傳播、知識、想像、訓練無能症

智慧藏

---

\* 政治大學新聞學系教授。E-mail: waynechu@nccu.edu.tw

望眼今日台灣的傳播研究，系所林立，論文產量穩定成長，就形式要件而言，已可和傳統學門分庭抗禮。

同時，我們也不難感知到空氣中的騷動。這也是一個眾聲喧嘩的時代。過去，我們可以明確界定傳播學門的核心知識，如今各家典範、理論、方法紛湧而出，對傳播為何各持己見，再難有共識。在行為科學當道的年代，傳播學者的主要語言是卡方、變項，如今則南腔北調，文學、心理、科技各種語言百家爭鳴。傳播學者之間溝通漸如同雞同鴨講，傳播研究進入了巴伯塔的世紀。慢慢地，與異領域對話容易，不再有隔行如隔山的生疏，反而是「同行卻隔山」成了常態。

許多人認為這是傳播研究的一個危機。我倒不這麼想，在向心力和離心力之間，在和諧的大一統和眾聲喧嘩之間，我倒對眾聲喧嘩有一份期待，因為我在大一統的局面中看到了想像力的枯竭，卻在眾聲喧嘩中看見了學門的生機。

## 壹、當心訓練無能症！

這篇短文主要的論點是：就學門的發展而言，一聲獨大未必是件好事，容易誘發訓練無能症，而在學門定型之際，這種情形特別可能發生。反過來說，眾聲喧嘩不但不足以為懼，如果掌握其精神，反而是學門成長的契機。

先讓我們認識訓練無能症。訓練無能症，就個人而言，指的是知識太過成熟反而喪失了思考和想像的能力。社會學家 Mills(1959)說得最明白：匠」最大的問題是「訓練得太精準。訓練只能讓人知道已知，這反而阻礙了人學習新事物，也使人無法接受最初必然是鬆散和粗糙的新觀念」(p. 211-2)

學術社群會不會和人一樣，也會產生慣性的思考？Reiss (1992)正有此意，他在一篇題為「社會學者的訓練無能症」的文章裡，批評社會學由於傳統和師承，過度依賴以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研究，反而忽視其

他研究的途徑如直接觀察，他指出這正是典型的訓練無能症。

以上 Mills 和 Reiss 的觀點，道出了知識的吊詭：學問過於成熟，反而容易習於特定的角度，不再有開創時期活潑的想像。從許多學門發展的歷史看來，這似乎是常態。學門草創之初，如發現新大陸，疆界未定，處處是驚奇。研究者游走知識的蒼茫大地，探索每一條可能的取徑；用理論和方法，百無禁忌，充滿想像，毫無界限之分。學門定型之後，反而開始劃地自限，透過各種機制如教科書、課程、期刊、學會等，定出了學門的疆界，以便區分什麼是正統，什麼不是。開山祖師當年探險的路線圖，他們使用的方法，成為學門的成規；學門地圖的路徑如今清晰而明確，但是卻看不到筭路檻樓時想像、遲疑和傍徨的痕跡。更令人擔憂的是，後來者竟以為地圖就是真實，再也看不到其他可能的路徑。

這裡產生了一個矛盾的現象。學門接收了前人豐富的知識和經驗，承襲了井然有序的行規(例如：研究方法)，但是也可能因此產生慣性思考。後來者從選擇問題、研究的取徑到書寫格式，從此遵循固定的形式，例如社會學習慣上採用問卷調查進行研究，至此形式代替了思考。

而這種趨勢在台灣更是明顯。台灣的傳播研究，取經於西方，和知識開創時的情境更為遙遠，由於此一特定的歷史因緣，也更容易感染訓練無能症。

## 貳、形式主義

在本地的傳播研究，最常見到以下幾種現象：不管什麼問題和現象，只從一兩個固定的理論和角度切入，結論也常有一定的方向。過於重視研究方法，以方法為研究的核心要件，以為掌握了研究方法，即打開了知識的大門。寫論文，往往想到的第一件事不是分析問題和現象有何特性，而是要用什麼方法。對許多研究者來說，方法就是一部機器，打開開關，輸入資料便可產生資料和證據。到了極端，研究形同技術操作。

在這些表層的現象之下，其實隱藏了一些對知識的迷思，這些正是訓練無能症的主因。

第一、方法、理論經常和問題脫節。這正是前述 Reiss 批評社會學者的重點：不是不可以用問卷調查，問題是有些社會現象用別的方式更為適當。作研究是解決問題，要先分析問題的特性，要了解研究的情境。否則，即使熟悉理論和方法，如果文不對題，殺雞用了牛刀，仍是徒勞無功，淪為形式。可是台灣的傳播研究往往直接套用理論和方法，相對而言，輕忽問題之界定和分析。

這裡可以引用哲學家 Ryle(1954)對知識的分類，進一步指出，台灣傳播往往只展現了「知道什麼」(knowing that)的知識，而未能完全掌握「知道怎麼作」(knowing how)的知識。所謂 knowing that 是指外顯形之於文字的規則(棋譜、研究方法、編採手冊等)。Knowing how 則是指在解決問題當下時所應用的知識。Ryle 以下棋為例說明兩者的區別：

如果一個男孩只會背誦規則，不能說他知道怎麼下棋。他要能實際照規定出招才算真知道下棋。反過來說，如果他每一步棋都中規中矩，不犯規，如果對手不按規矩下棋，他馬上知道提出抗議，那麼，即使他不曾背規則，我們也要說他知道怎麼下棋。(p. 41)

延伸 Ryle 的觀念，作學問的功夫不僅在於掌握相關理論和方法，更重要的是能夠掌握研究問題的特性，進一步針對問題應用相關的理論和方法。Knowing how 並無常規，因情境而異，需要研究者發揮想像力。從這個角度，每個研究問題有其特殊情境，好研究也因此必然是獨特的、本土性的。反過來說，研究如果只知臨摹前人的格式，結果便會產生理論、方法和問題脫節的現象。只能算是知道 knowing that，稱不上是懂得 knowing how。坦白地說，台灣的傳播研究從養成教育到成品，一個大問題即在過度重視 knowing that 的知識，而忽視了 knowing how 的功夫。

第二、忽視 knowing how，又和本地對研究者角色的認知有關。

過於重視形式，相對貶抑了研究者主動的角色，輕忽了研究者拿捏和取舍的功夫。根據形式主義的思維，作研究只要掌握「對」的知識形式（通常是社區習慣的形式），自然會產生預期的結果；研究者像是形式附身的乩童，或是生產線上的工人，從研究問題、方法、分析到書寫方式，遵循慣性的思考模式，身不由己，照典操兵。換言之，「我」不見了。這種態度基本上不鼓勵研究者發揚個人風格，發揮想像和主見，甚至以客觀之名，將個人的涉入污名化。

「無我」的研究，事實上是不了解研究的旨趣正在於想像和熱情。作學問本質上是「我」和真實的互動；因此「我」才是認知的主體(knowing subject)。具體來說，在研究的過程中，「我」應該是主動的，活躍的。「我」才是研究活動的主體，形式只是工具，不宜喧賓奪主。

我們可以量化為例來說明研究中「我」的重要。量化一向給人一個錯誤的印象：就是研究像開火車，有常軌可循，因此很少強調想像的重要性。可是從量化的歷史看來，量化研究絕非只是循著客觀的規則找資料，讓證據說話，其實研究者主觀的詮釋和想像必須扮演關鍵的角色。最好的例子是有關效度的討論。Cronbach 和 Meehl 於 1954 年論效度的文章是效度觀念的經典之作，但是大家或許不知，多年來 Cronbach（例 1988, 1989, Kane, 1992）一再埋怨：大家常將效度簡化成幾個數學公式，完全誤解了他對效度的看法。他強調在評估量表的效度時，重點在對於所得數據的詮釋和應用是否言之成理；例如我們不能說智商量表本身有沒有效度，而應該說數據詮釋的方向有沒有效度。Cronbach 進一步指出，評估效度要參考特定文化社區的價值和理念，換句話說，詮釋是否有用視情境而定。換言之，即使是在一般人誤以為是強調客觀中立不講價值判斷的實證研究，研究者其實扮演著主動積極的角色，從選擇問題到方法、分析和詮釋，在在都要「我」介入。

形式主義的另一個後遺症是：研究者不容易看到各家理論和方法的預設立場和侷限。

台灣作為西方學術的輸入國，這種現象更是普遍。正如黃光國

(2002) 所指出，國內引進西方理論和方法，由於忽視方法後面的方法論，往往不易掌握西方學術思潮的邏輯和精神，消極而言，也不易察覺形式後面的預設立場。以學術書寫格式為的例，所有文體背後都有一套對真實的預設。例如社會科學慣用的 APA 格式，表面上強調中立和客觀，實際上反映了行為主義的知識觀 (Bazerman, 1987)。其他學門如社會學、人類學這幾年也有諸多類似的討論，重點均在強調書寫格式絕非純然是客觀中立的語言工具 (e.g., Atkinson, 1990; Marcus, & Fischer, 1999)。如果我們對這些形式缺乏反思的態度，結果只能為形式所役。

### 參、本質主義

不過，形式主義發揮到極致，最大的問題是可能產生本質主義的知識觀，進一步形成了學術溝通和想像的障礙。

所謂本質主義，就是以為目前習見的理論和方法即是學門唯一的真理，唯一的道路。連帶地，本質主義相信學門的範圍和界限是客觀的事實，就像山川日月，從盤古開天闢地就已存在，也因此嚴格劃分學門的界限，不容許有灰色地帶。國內傳播界喜歡用二分法定位自己和別人，基本上反映了這種本質主義的分類觀。例如強調傳播和其他領域不同，在學門內則重視次領域之差異；將研究或學者分類時，非量化即質化，陣壘分明，如夷夏之防。總而言之，本質主義者的世界井然有序，萬物有常，各有所屬。作研究時該參考那些文獻，採用那種方法，均須遵守領域正式的限制。推到極致，甚至以為現有系所的編制即是知識版圖的分界，例如認為新聞系和廣電系研究的是不同的學問，課程也應該涇渭分明。

其實，社會現象的分界往往是人為的建構，這點不少人談過，不用我多說 (如 Lakoff, 1987; Zerubavel, 1991)。這裏只提出兩個觀點。第一、知識領域的疆界，和政治版圖一樣，多半是歷史政治因素交錯的產物，並非自然天成。以心理學為例，一直到二十世紀初期，心理學界對

於主觀的心理現象是否可以量化，仍然爭論不休。而量化後來所以脫穎而出成爲主流，原因之一是迎合當代強調標準和一致的社會思潮(Hornstein, 1988)。換言之，心理學今日之形貌某種程度是當代社會和文化環境的產物。可是對於後人來說，這已是一段遺忘的歷史。到了領域知識日趨成熟，寫成教科書，一切已成定論。教科書通常不會提及方法後面的哲學和數學理論，更不會將塵埃落定前的種種爭議從頭說起。於是，研究用量表和統計，成了理所當然、天經地義的行規，成了心理學的本質知識。

第二、再說，就社會科學的現況而言，眾聲喧嘩恐怕是無法阻擋的趨勢。如果仍堅持領域的分野，恐怕是不切實際，是鎖國政策。

根據社會科學史學家 Levine(1995)的看法，七十年代以來，幾乎所有的社會科學領域都面臨了認同危機。這個趨勢有三個特性。

第一、傳統領域間的界限日漸模糊。過去領域之間涇渭分明，有各自獨特的問題、理論和方法。現在則少有概念、方法、問題是特定學門所專屬；例如夢過去是心理分析的領域，如今人類學家也進入夢的世界探求動機的起源；社會學和經濟學的疆界也犬牙交錯；社會學家用經濟模式分析決策過程，經濟學家也開始進入原野作研究。

第二、冒出了許多超越傳統界限的研究領域，它們或是領域通婚的產物，或是領域之間的無人地帶。Levine(1995)以國際政治作比喻，說明領域界限日漸模糊的事實。過去國家是國際政治的主角，國家之間界限分明，今日在國家之上出現了許多跨國組織，模糊了傳統國界的分野。學術領域之間也一樣，許多本爲領域專屬的問題，如文化，今天已成爲跨領域的議題。

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這類新興的領域如雨後春筍紛紛出現，如區域研究聚各領域專家於一堂，結構主義則橫跨人類學、語言學、數學、心理學；認知科學範圍更廣，匯集哲學、心理學、語言學、社會學、電腦科學而大成；文化研究所涉及的議題從族群、性別、運動到資本主義形式，凌駕於諸多傳統領域之上。

第三、結果，名義上屬於同一領域者，在問題、概念和方法上卻可能更接近領域外的人，和同領域者缺少共通的語言，反而漸行漸遠。

Geertz (1983) 指出，在這種情勢下，不只是知識版圖的變遷而已，事實上製圖的方式也產生了革命性的改變。想像這麼一張地圖：上面的國界不再涇渭分明，國上有國（如國際性組織）。這時再堅守傳統對領域的定義，已無意義。

### 肆、發現眾聲喧嘩的契機

從以上的討論看來，學門定型之後，如果過於拘泥於形式，反而可能失去了研究中最可貴的要素—想像。反過來說，眾聲喧嘩處反而生機旺盛。正好像文明在會流中綻放異采，由近代學術發展史的經驗看來，最動人的成就往往出現在學門的邊陲—那眾聲喧嘩之地，認知科學、文化研究就是。學術大師的特色之一就是不遵守領域的侷限，他們常是主流領域的邊緣人，也因此得以另立天地 (Gardner, 1993)。

因此，此時此地，傳播出現了眾聲喧嘩的跡象，是件好事。它至少使我們察覺到作學問不只有一條道路，使我們意識到其他的可能。因此我認為在眾聲喧嘩的時刻，要關心的不是如何維持領域大一統的局面，鞏固向心力，打一場政權保衛戰，而是如何享受離心的快感，把握大好時機，創造思想的新局。總而言之，眾聲喧嘩並不可怕，倒是要視其為契機，趁機開展學術的新局。

但是，契機可以是大好，也可以是大壞。眾聲喧嘩也可以有好、壞兩個不同的版本。壞的眾聲喧嘩是：各吹一把號，大家在乎的仍然是如何在戰國群雄中逐鹿中原，成就自家的霸業，結果也就只能是各據山頭，各說各話了，骨子裡仍然是相信形式主義和本質主義，同樣有感染訓練無能症的危險。

那麼，我們要如何善把握眾聲喧嘩的契機呢？

其實很簡單，就是回到眾聲喧嘩一辭的本意，彰顯和發揮學術社區



民主、互動的本質。眾聲喧嘩一辭來自 Bakhtin，他心目中的眾聲喧嘩是：

眾聲喧嘩中的各家語言，不管它們背後的原則為何，不管它們如何獨特，都是觀看世界的角度，都是特定的世界觀，代表了用文字呈現世界的特定形式，各有其特定的對象、意義和價值。它們互相比較、互補、對話、對抗（1981, p.115）

眾聲喧嘩理想上是一種對話的文化。增設系所、開研討會、辦刊物，不會自動產生互動的文化，觀念、態度和習慣要先改變，要體認到自己研究的方式只是眾多可能中的一種，要和別的理论、方法「比較、互補、對話、對抗」，進一步愛上智慧火光四放的樂趣。在這樣的文化氛圍裏，容許異端，鼓勵實驗是常態也是常識。這個道理不需要長篇大論來說，只要看看一流學術社區的典範即可。

Platt(1964)研究分子生物學為何成為頂尖的學門，他將之歸因於其對話的文化。一個具體的例子是，實驗室門口常有個大黑板，每天都有人針對研究議題在上面發表意見或質難問辯。

在一流的研究社區或單位，對話常不拘形式，隨時隨地可以進行。一個例子是普林斯頓高等學習研究中心，中心有個餐廳，敦請一流名廚掌廚，中午時分大家喜歡去那裡高談闊論，智慧的火光四放，難怪出了愛因斯坦這一號人物。

這種境界，我心嚮往之。反過來看國內的傳播研究，社區不大、年輕，照理說應該最易於產生對話的氛圍和文化，但是傳播人或許是領域意識過於強烈，卻是最吝於對話的一群。趙雅麗和我（1999）曾經研究國內傳播學者互動的模式，從論文互引的次數看來，國內學者主要是朝著西方對話（應該說是聽西方說話），至於彼此之間，幾乎是不相聞問。這個發現令人驚心動魄：我們竟是一個連吵架都沒有機會的社區。如果我們嚴守學門的界限，不傾聽對方說話，即使我們有再多的系所、研討會、學術期刊，我們仍然成不了一流的學門。

眾聲喧嘩另一個重要的精神是民主。Bakhtin 關心的一個主題是：

在社會中大一統的、權威的論述和少數的論述之間的張力，或者可以說，離心力和向心力之間的拉鋸。在他的心目中，社群中向心力過大、中央論述過強，反而扼殺創意。他嚮往的是嘉年華會的眾聲喧嘩，讓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如何辦一場多元而民主的嘉年華會呢？首先要解除形式主義和本質主義的韁索。這前面已說了不少。簡單的說，要研究傳播現象，而不是研究傳播學。這句話的意思是：就是不以現有的知識形式為唯一的真理和道路，不要誤以為現有傳播學的內容（包括它所提出的問題、研究取徑……）就是傳播現象全部的知識。傳播學目前的形式，正像中世紀的宇宙圖，它只涵蓋了傳播大陸「已知」的部分，摻雜了傳說和偏見，和傳播現象本尊應有所區別，更不可視作唯一的地圖。這些地圖可以參考，但不要為其所侷限，才可能向未知邁進，問自己的問題，尋找自己探險的路線。

不過，光說研究者侷於現有知識的形式、不願想像，恐怕也不盡公平。我們也要想想，是不是目前評估研究的制度和環境不鼓勵想像？使個中成員只敢遵循已知的地圖，不敢向未知邁進。這和現行守門制度、守門人的態度有密切的關係。有沒有可能，目前的守門人仍然勘不破地圖的迷思，堅守著祖傳的地圖，要用它作為衡量知識唯一的尺度？因此後來者為求生存，只好步步為營，從理論到方法以保守為宜，不敢太有創意，結果最好也只能作到嚴謹有餘，創意不足。我們必須無奈的承認：以目前評估研究的體制，嚴謹和創意之間，嚴謹畢竟比較安全。一篇論文即使卑之無甚高論，只要中規中矩至少可以怡享天年；相對而言，再有創意，如果文獻不足，方法不清楚，預期成果不可知（很不幸的是，創意有這幾項特性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要冒幾分風險。不管這層心理的束縛是否真實，的確對有心創新者，產生了負面的壓力。比較令人擔心的是，有礙創意的社區氛圍會不會進一步成為不朽之身，從此形成了本地傳播研究的文化？

台灣的傳播研究要從中規中矩向卓越邁進，要從守門人的心態、守

門制度改變，才能創造一個鼓勵創意和想像的環境。

在這些大前提之下，我們也許也不必過於在意領域之間的界限，更無需擔憂學門的正統性。

前面提到，領域界限模糊，已是不可抵擋的趨勢。在此一情勢下，鎖國政策是不可為也，不如敞開大門，在學術上則盡去藩籬，盡情交流。

我們應把學門當作政治體制，是個必要的罪惡。但是，讓政治的歸政治，學術的歸學術。作學問，用理論和方法，只問它是否有用，能否開拓視野，能否解決問題，何必管它名義上來自那個領域？就知識而言，豈有本質上非為傳播學門所專屬的知識範疇？

根據這麼一個理念，作研究應該是百無禁忌吧？不再被領域的界限所約束。作研究最適當的比喻是超文本，研究的起點是個結點，隨著問題的發展自由聯結相關的網站。在這樣的想像之下，傳播研究可以向社會學取經，也可以與生物學對話，即使有一天傳播學門因融入其他學門而走入歷史，又有何不可？

智慧藏

## 參考書目

- 黃光國 (2002)。《科學哲學與創造力》。台北：商務。
- 趙雅麗、鍾蔚文 (1999)。《傳播學術期刊評鑑報告》。台北：行政院國  
科會人文及社會發展處。
- Atkinson, P. (1990). *The ethnographic imagination: Textu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Bakhtin, M. M. (1986). *Speech genres & other late essays*.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Cronbach, L. J., & Meehl, P. E. (1955). Construct validity in psychological test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52, 281-302.
- Cronbach, L. J. (1988). Five perspectives on validity argument. In H. Wainer & H. I. Braun (Eds.), *Test validity* (pp. 3-17).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 Cronbach, L. J. (1989). Construct validation: After thirty years. In R. L. Linn (Ed.), *Intelligence: Measurement, theory, and public policy* (pp. 147-171).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Gardner, H. (1993). *Creating minds: An anatomy of creativity seen through the lives of Freud, Einstein, Picasso, Stravinsky, Eliot, Graham and Gandhi*.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 Geertz, C. (1983). *Local knowledge*.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 Hornstein, G. A. (1988). Quantifying psychological phenomena: Debates, dilemmas, and implications. In J. G. Morawski (Ed.), *The rise of experimentation in American psychology* (pp. 1-34).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Kane, M. T. (1992). An argument-based approach to validity.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2(3), 527-535.
- Lakoff, G.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evine, D. N. (1995). *Visions of the sociological tradition*.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arcus, George E., & Fischer, Michael M. J. (1999).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An experimental moment in the human sciences* (2nd ed.).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eiss, A. J., Jr. (1992). Trained incapacities of sociologists. In T. C. Halliday & M. Janowitz (Eds.), *Sociology and its publics* (pp. 297-312).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latt, J. R. (1964). Strong inference. *Science*, 146, 347-353.

Zerubavel, E. (1993). *The fine line: Making distinctions in everyday life*.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Who is Afraid of Heteroglossia? Notes on Trained Incapacities

Wei-wen Chung\*

### Abstrac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Taiwan, which has witnessed the emergence of a variety of perspectives, should take precautions against the possibility of trained incapacities. To be specific,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Taiwan has suffered from a slavish conformity to existent forms of knowledge and has furthermore adopted an essentialist view of disciplinary knowledge. To counter this tendency,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research community adopt the heteroglossic spirit as conceived by Bakhtin, thereby promoting a democratic community and encouraging dialogues among different theories and methods.

**Keywords:** heteroglossia, formalism, essentialism, validity, communication, knowledge, imagination, trained incapacities

---

\*Wei-wen Chung is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